

國學

第六集



巴蜀書社

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GUO XUE

國學

第六集

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國學·第六集/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主辦, 一成都: 巴蜀書社, 2018. 8

ISBN 978-7-5531-1019-6

I. ①國… II. ①四…②四… III. ①社會科學—中國—叢刊
IV. ①C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167505 號

GUOXUE

國學(第六集)

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責任編輯	王 雷
封面設計	張迪茗
出 版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 028-64715762)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插 頁	4
印 張	34.75
字 數	750 千字
印 數	1400 冊
書 號	ISBN 978-7-5531-1019-6
定 價	76.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發行科調換

《國學》集刊學術委員會

顧問

丁任重 汪明義 蔡競 何天谷

主任

汪燕崗

委員（按姓氏筆畫爲序）

王川 向熹 吳光 何靖
林慶彰 胡昭曦 高令印 孫以昭
萬光治 舒大剛 曾棗莊 楊晉龍
解玉峰 趙飛鵬 蔣寅 熊良智
龍達瑞 鍾仕倫

主編 劉敏

審定 謝桃坊

編輯部主任 湯君

執行編輯 彭東煥

編輯 趙海海

編務 王懷成

目錄英譯 郭一丹

重拾國學固修身
處世之本信中華
文化精神

吳文津題

戊戌年二月
年九十六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原館長吳文津先生題詞

真正的文學是
捍衛人性的，
杰出的作家最
終關懷的是人
的心灵自由。

寧宗一



二〇一八、五、廿九

雜谷腦河上之黃昏
一九六一年
青城先生
畫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何青城先生畫作《雜谷腦河上之黃昏》（132cm × 70cm）

啟事

我刊由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與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共同主辦，迄于二〇一七年已出版五集。我們謹此感謝學界師友的大力支持。向寶雲先生因工作調動，不再擔任主編，故自第六集起本刊由四川師範大學中華傳統文化學院與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繼續辦下去。我們當勉勵工作，以使此刊愈辦愈好。

國學集刊編輯部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謹啟

CONTENTS

On Sorting out th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Scientific Method	<i>Xie Taofang</i> (1)
Macro Aspect on the Renewal of Novel Concept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	<i>Ning Zongyi</i> (21)
Early Intellectual Efforts i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Quintessence School in Late Qing	<i>Zeng Ping</i> (30)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Filial Pie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Huang Zhenping</i> (49)
Chronology of Historical Events in Wuyue	<i>You Tingting & Zhang Jue</i> (61)
Textural Research on the Edition Age of Shan Hai Jing	<i>Yang Yulian</i> (90)
Textural Research on Sariputra'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Fundamentali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Wang Qian</i> (104)
Textural Research on Compilation of Yao Shan Yu Cai	<i>Liu Quanbo</i> (119)
Errata and Some Arguments on Tang Zhi Yan Jiao Zhu	<i>Tao Yi</i> (130)
Textual Criticisms and Explanations of Five Gao Shens and Two Funeral Orations in Tang Dynasty from Zhong's Genealogy	<i>Xie Wenxue</i> (140)
New Discussions about Ou Yangxiu's Concept of Writing and Tao	<i>Gao Xiuhua</i> (161)
The Analysis of Song Ci Poetry's Trumpet Tone of Liu Zhou	<i>Huang Min & Tian Yuqi</i> (189)
On Poli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from Lian Gong Mu Be	<i>Mao Yusong</i> (197)
Compile and Emendation of the Famous Liu Changyan's Lost Articles in Jin Dynasty	<i>Ma Zhenjun</i> (221)
Compile and Emendation of Duan Clan's Grave Monuments in Jin Dynasty	<i>Deng Guojun</i> (230)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Sylloge of Bashu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	<i>Xia Shaohui & Li Wenzhe</i> (238)

Corrections about Yang Shen's Track between Yunnan and Sichuan	<i>Zhang Fu</i> (247)
Textural Research on Zhang Sanfeng's Track in Sichuan	<i>Du Yangguang</i> (262)
Textural Research on Zhou Qi's Track from Ming to Qing Dynasty	<i>Xie Mingyang</i> (283)
On Suxiu and Linxi in Qing – Focus on Tong Cheng School	<i>Zhang Xiuyu</i> (324)
Zhang Xuecheng's Theory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Zhang Hebin</i> (342)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Dramatist Wang Yun's Life Stories in Middle Qing	<i>Han Yutao</i> (355)
Discussions on Intension of Jiang Sheng's Shang Shu Ji Zhu Yin Shu	<i>Hong Bosheng</i> (369)
Chen Sanli and Gan School of Tong Guang Poetic Style	<i>Hu Yingjian</i> (382)
Comparative Studies on Pi Liu Pian and Xin Xue Wei Jing Kao	<i>Huang Kaiguo & Huang Zijian</i> (398)
On an Adher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rtist Chen Moxiang's Life and Achievements and Peking Oper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Zhou Qian</i> (410)
Sequel to Jin Ling Sheng Xiao Yan	<i>Jiang Yin</i> (424)
Summary and Review of ShiJing and the Etiquette System in TaiWan—Focus on Dissertations	<i>Lin Shuzhen</i> (455)
The Origi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American East Asian Library	<i>Wu Wenjin</i> (473)
A Rendering of English Content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inology CLEA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79—2014)	<i>Bian Dongbo, Wang Mengling & He Qinxin</i> (490)
Compiled Annotations from Zhang Xianzhong Written by Ren Naiqiang	<i>Guo Yidan</i> (521)

Notice to Contributors

目 錄

關於整理國故與科學方法	謝桃坊 (1)
明清時期小說觀念更新的宏觀考察	寧宗一 (21)
從晚清國粹派看中國知識人建構國族認同的早期努力	曾 平 (30)
論傳統中國的“以孝治天下”	黃振萍 (49)
先秦吳越史事彙考繫年	尤婷婷 張 覺 (61)
《山海經》成書年代考論	楊玉蓮 (90)
漢譯佛經原典中的舍利弗身世考	王 倩 (104)
《瑶山玉彩》編纂考	劉全波 (119)
《唐摭言校注》正疑	陶 易 (130)
《鍾氏族譜》中唐代五篇告身和兩篇論祭文考釋	謝文學 (140)
歐陽修文道觀新論	高秀華 (161)
兩宋鼓吹曲詞調《六州》考析	黃 敏 田玉琪 (189)
從《連公墓碑》看宋朝政治	毛雨松 (197)
金代名士劉長言佚文輯校	馬振君 (221)
金代稷山段氏墓碑輯校	鄧國軍 (230)
淺述明代巴蜀文學總集編纂	霞紹暉 李文澤 (238)
楊慎滇蜀往返行迹補正	張 芾 (247)
沽酒臨邛，逍遙仙洞：張三丰巴蜀行迹考論	杜陽光 (262)

周岐入清前後的行迹考論	謝明陽 (283)
清代束脩與廩餼考述——以桐城派為中心	張秀玉 (324)
章學誠的“學”與“文”	張何斌 (342)
清中期戲曲家王筠生平新考	韓郁濤 (355)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注音解經”之內涵析論	洪博升 (369)
陳三立與同光體贛派	胡迎建 (382)
《辟劉篇》與《新學偽經考》的比較	黃開國 黃子鑒 (398)
清遺民京劇家陳墨香生平及成就述論——兼及民國時期的京劇	周 茜 (410)
《金陵生小言》續編	蔣 寅 (424)
臺灣地區《詩經》與禮制研究成果綜述——以學位論文為研究範疇	林淑貞 (455)
美國東亞圖書館收藏中國典籍之緣起與現狀	吳文津 (473)
美國漢學期刊《中國文學》(CLEAR) 論文目錄 (1979—2014) 漢譯	卞東波 王夢玲 何沁心 (490)
《張獻忠》評注輯錄	郭一丹 (521)

稿 約

關於整理國故與科學方法

謝桃坊

中國在 20 世紀初年興起的國學運動，以 1905 年上海國學保存會主辦的《國粹學報》的創刊為標志，迄於 1949 年新中國的建立，這一運動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我們回顧國學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明顯地看到，它自始至終是存在兩個傾嚮的，即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為主的國粹派和以新文化學者為主的新傾嚮派。《國粹學報》於 1911 年停刊，表明國粹思潮的衰微；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於 1923 年創刊，則表明國學運動新傾嚮的形成。雖然新傾嚮迅即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並由顧頡剛發起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學派的支持與推動而取得巨大的成就和深廣的影響，然而國粹主義的緒餘仍盤根錯節地存在。國學運動新傾嚮之所以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是由於眾多新文化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的觀點、新的態度和採用的新的研究方法，適應了學術發展的新趨勢，從而成為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於 1919 年 2 月 1 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代表了新文化學者對國學研究的態度，即反對國粹主義。他說：“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需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清理國故的工夫。”^① 他認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化，這一切均落實在對國故的整理上。他發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這得到學術界熱烈的響應。北京大學學生創

^①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第 57—81 頁。

辦的《新潮》雜誌於1919年5月1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五號上發表了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的精神》。他認為：“用科學的精神去研究國故，第一件事就是用科學的精神去採取材料。凡考古的學問和他種的學問相同，最要的事情就是有精確的材料。論斷的價值和材料有密切的關係，材料不精確，依據這個材料而立的論斷，也就沒有價值了。”時任《新潮》編輯的傅斯年在同一期發表《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大力支持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以為其應是將有益於中國學術界並裨益於世界的科學。他說：“‘國粹’不成一個名詞（請問國而且粹的有幾），實不如國故妥帖。至於保存的粹尤其可笑……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絕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① 1926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上回答了某些學者關於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質疑。他說：“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學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倘使科學是不腐敗的，國學也決不會腐敗。倘使科學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國學也不會葬送青年的生命。……至於老學究們所說的國學，他們要把過去的文化作為現代人生活的規律，要把古聖賢遺言看作‘國粹’而強迫青年去服從，他們的眼光全注在應用上，他們原是夢想不到什麼叫作研究的，當然談不到科學，我們當然不能把國學一名輕易送給他們。”^② 這是將國學運動新傾嚮與國粹派的根本區別歸結為研究方法的相異，而以科學方法研究國學是國學運動新傾嚮學者的基本學術特徵。自《國學季刊》創刊以來，全國重要高等學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紛紛設立專門的國學研究所並出版專門的刊物，使國學運動沿着新傾嚮的道路發展，形成以科學考證為時尚的熱潮。史學家蒙思明於1941年談到當時的學術風尚深有感慨地說：“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金字招牌下……竟變成學術界惟一的支配勢力。學者們高談整理國故，專崇技術工作，使人除考據外不敢談史學。評文章的以考證文章為優，倡學風的以考證風氣為貴，斥理論為空談，尊科學為實學。”^③ 這裏他從否定的方面反映了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已在學術界具有強大的支配勢力，而且將國學家們提倡的科學方法等同於考據學，而這確實是國學運動過程中的真實情形。新傾嚮國學家在吸取和應用西方近代科學方法時，實際上採用了實證的科學方法。不僅國學家們如此，實乃淵源於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思潮。這種實證的自然科學方法是在晚清時期隨着西學東漸的加強而逐漸引入中國學界的。

科學方法是什麼？1902年梁啟超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精神與方法時說：“所謂的科學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問，不肯妄循古人之成說與一己之臆見，而必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即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佐證，二也。其學之發達，

①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頁。

② 阿英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第169頁。

③ 蒙思明：《考證在史學上的地位》，《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八期，1941年12月。

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明者，啓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後人因其所啓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科學所以成立之由。”^① 他的概括是較全面的，即客觀的、求真的態度是科學精神的體現，專門的、系統的、重證的、比較的研究是科學的方法。1914年9月由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隽、趙元任、胡明復、楊銓等創辦的《科學》月報在上海出版，此刊旨在介紹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傳入中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迄於1950年計三十五年間共發行三十二卷。任鴻隽在《科學》創刊號（1914）上論及科學是什麼時說：“科學者，知識而有系統之大名。就廣義而言，凡知識之分割部居，以類相從，並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言之，則知識之間於某一現象，其推論重實驗，其察物重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今世普所謂之科學，狹義之科學也。”^② 關於具體的科學方法，任鴻隽概括為一個合理的程序：分類—歸納—假設—形成定律或學說。這是從自然科學研究重客觀、重實證的特點而形成的有序的、細密的研究過程。1926年金岳霖在《晨報副刊》第五十七期論述科學方法說：“科學的方法，是由小而大，由精而博，先得事物之詳，然後求它們的普遍關係。他們所用的度量有極妥當的權斷，他們所用的名詞有同行公認的定義……科學家研究一個問題，可以把範圍縮小，也可以把範圍擴大。……約言之，科學家的思想，有試驗與實驗的可能……科學家的試驗，不限於一次，本自己的力量，可以造出同等的情形，有了同等的情形，就是試驗千百次都可以，而千百次試驗的結果都差不多。”^③ 他理解的科學方法是在研究中必須有同類的規範的大前提，採用同類的方法，裁定研究的具體範圍，研究的結果具有重試的可能。我們如果將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與西方近代科學方法相比較，則不如西方的客觀、精密和先進。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嚮西方尋求真理的過程中就純學術而言，特別看重西方的科學方法，而介紹西方科學方法遂成為一種學術風尚。例如：魏嗣鑾的《自然科學上思想的法則》（《少年中國》1919年1月），王星拱的《科學的起源和效果》（《新青年》1919年12月）、《什麼是科學方法》（《新青年》1920年4月），朱階平、陳廣沅譯《科學概論》（《覺悟》1922年3月），唐鉞的《科學的範圍》（《晨報副刊》1923年7月10日），趙涵川的《實驗科學的方法》（《學生雜誌》1930年4月），以上枚舉的論文可以反映學術界對科學方法的關注和需要。

科學方法本是西方近代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當其介紹入中國後，廣為社會科學研究所採用，尤為國學家們所採用，這亦源自西方近代的實證主義哲學思潮。西方近代自然科

①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87頁。

② 任鴻隽：《論中國無科學的原因》，轉引自胡軍：《分析哲學在中國》，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頁。

③ 金岳霖：《唯物哲學與科學》，金岳霖學術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編：《金岳霖學術論文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59頁。

學是以實證為基本特徵的。近代的天文、地質、生物、物理、化學等學科因採用實證方法而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它們的研究方法構成一個嚴密的程序，由此產生科學方法體系。西方實證主義哲學的創始者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法國著名哲學家，他主張將自然科學方法運用於“社會學”（此名詞是他提出的），實指社會科學。他在1844年著的《論實證精神》裏說：“實證一詞指的是真實，與虛幻相反……主要在於以精確對照模糊……精確的含義使人想起真正哲學精神的恒久傾嚮，即處處都要贏得與現象的性質相協調並符合我們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確度。”^① 實證主義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祇承認感官認識為實在的可以把握的具體對象，以邏輯分析的陳述作出真或假的判斷。孔德認為實證方法是完全可以應用於“社會學”的，他說：“我們在今天適度普遍推廣於實證學科方面所應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後是社會的效果；這種重要效果必然取決於嚴格遵循序列規律。為了對個人迅速傳授或是為了對集體長時間傳授，實證精神都必須從最初的數學狀態逐步過渡到最終的社會學狀態，先後通過中間四個階梯：數學的、天文學的、物理學的、生物學的。將來仍然必須如此。”^② 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亦是社會科學理論構建的方法論，但社會科學在應用時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之相異所致。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涉及人類的領域，因而預言的可能性受限於人類行動的決斷範圍；但是自然過程的齊一性又使準確的預測成為可能：此即是科學進步的重要原因。實證主義的科學方法之傳入中國並為中國學術界所接受的是穆勒的《名學》、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爾的《方法論》。這三位西方近代學者皆屬於實證主義哲學家，他們對科學方法作了系統的論述。

二

嚴復是中國近代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啟蒙思想家。他將近代西方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著作譯述入中國，尤其是《進化論》的譯述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巨大，由此形成一時的新的社會思潮。他亦是第一個將西方近代科學方法系統地譯述入中國的學者。嚴譯《穆勒名學》於1905年由金陵金粟齋刻印，1912—1921年由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約翰·穆勒（J. S. Mill, 1806—1873）是英國著名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其邏輯學著作原書名“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嚴復按照中國習慣譯為“名

① [法] 奧古斯特·孔德著，黃建華譯：《論實證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9頁。

② [奧] 魯道夫·哈勒著，韓林合譯：《新實證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34頁。

學”。其書分為名與辭、演繹推理、歸納推理、歸納方法、詭辯、倫理科學的邏輯六個部分，是研究思維形式和規律的專著。嚴氏譯了半部，附加按語四十條。他將邏輯推理的“演繹”譯為“外籀”，“歸納”譯為“內籀”。“籀”乃抽取、抽繹之意。關於歸納與演繹的關係，穆勒認為事物的因果和現象是極紛繁的，如果要從其中尋找到某一規則，不能僅用歸納方法，還須用演繹方法，但也不能純用演繹方法。演繹方法應有三個程序：開始時以歸納的實驗為前提，繼以連續的推理，再從實驗得到印證。嚴復特別指出印證的重要意義：西方近三百年的科學公理之所以不被動搖，即在於它是經得住印證的。所以穆勒提出演繹方法的“三候”是嚴密的方法。中國傳統學術的根本問題是忽視對客觀事實的考察，亦不驗證事實，因而多屬於主觀臆造的論斷。嚴復舉例說：“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干支之分配，如九星吉凶之各有所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① 嚴復為中國學界引進了西方邏輯的內籀實測之學，指出了中國學術的缺憾，這使學界耳目一新，然而他並未將內籀實測之學與科學方法明顯地結合起來。1909年嚴譯《名學淺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著者為英國的耶芳斯（W. S. Jevons, 1835—1882）。此著共二十七章，前兩章為緒論，第十三至十四章論演繹邏輯，第十五至二十七章論歸納邏輯。《名學淺說》的影響遠勝於《穆勒名學》，曾被作為許多高校的教材。此後邏輯學在中國引起重視，大量的研究論文刊出。例如：徐彥之的《邏輯學者哲學之精》（《新潮》1919年1月1日）和他翻譯的《邏輯漫談》（《新潮》1919年2月1日），胡淑光的《邏輯漫談》（《政治學報》1920年），方東美的《邏輯短論》（《東南論衡》1926年4月），鄧性初的《歸納法與演繹法在教授上的應用》（《哲學月刊》1927年8月）等。

關於邏輯學引進的意義，正如哲學家馮友蘭所說：“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方法……西方的哲學研究雖有那麼多不同的門類，而第一個吸引中國人注意的是邏輯。”^② 邏輯分析是哲學的方法論，它對科學研究亦最具方法論的意義。

對於西方科學思想方法論的創立者培根和笛卡爾學說的引進始於梁啟超1902年發表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文中簡明地介紹了這兩大哲學家的哲學思想，而着重介紹了他們的科學思想方法論。梁啟超認為：“為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培根與笛卡爾。”^③ 這兩位哲學家關於科學方法論的著述的譯本於20世紀30年代之初開始在中國學術界流行開來。

① 嚴復：《穆勒名學》按語，王栻主編：《嚴復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047頁。

②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194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82—283頁。

③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2冊。